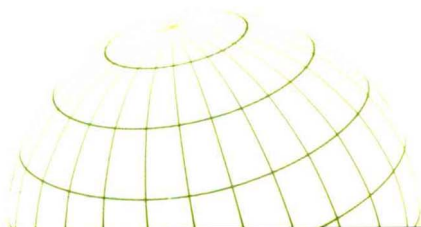




求解当代中国的 制度现代性问题

何美然◎著

A Study on Modernity
in Systems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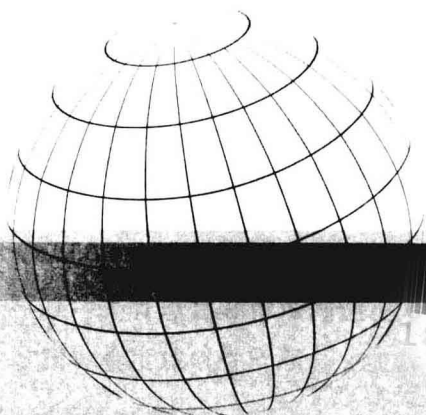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求解当代中国的 制度现代性问题

何美然◎著

A Study on Modernity
in Systems of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解当代中国的制度现代性问题 / 何美然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97 - 2316 - 6

I. ①求… II. ①何…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
国—现代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653 号

求解当代中国的制度现代性问题

著 者 / 何美然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魏小薇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班建武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236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316 - 6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论 / 1

- 一 时代与实践熔铸的重大课题 / 1
- 二 制度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形态解析与求解 / 3
- 三 制度现代性问题的分析框架 / 6
- 四 相关研究述要 / 12
- 五 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20

第一章 制度与制度现代化 / 22

- 一 制度的界定 / 22
- 二 权力制度、利益制度、能力制度 / 30
- 三 制度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 / 37

第二章 现代性与制度现代性问题 / 44

- 一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 44
- 二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的现代性问题 / 55
- 三 制度现代性问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阈中 / 71

第三章 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构想与实践 / 80

- 一 西方现代制度的精神基础及其缺憾 / 80

- 二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构想的基本取向 / 83
- 三 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构想的逻辑主线 / 90
- 四 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全景式扫描与基本趋向梳理 / 106
- 五 总结与前瞻 / 112

第四章 个体意志与社会公意的调适 / 114

- 一 个体意志和社会公意 / 114
- 二 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的调适 / 117
- 三 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整合 / 126
- 四 公共能力与个体能力的协调 / 137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价值与市场逻辑的契合 / 147

- 一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 / 147
- 二 市场逻辑：含义与特征 / 152
- 三 人民民主与市场逻辑的契合 / 157
- 四 共同富裕与市场逻辑的契合 / 165
- 五 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与市场逻辑的契合 / 172

第六章 在双重超越中推进中国制度现代化 / 180

- 一 传统权力制度的超越以及西方权力制度的借鉴 / 180
- 二 传统利益制度的超越以及西方利益制度的借鉴 / 191
- 三 传统能力制度的超越以及西方能力制度的借鉴 / 201

结束语 / 213

主要参考文献 / 218

后 记 / 232

导 论

迄今为止的人类认识和实践表明，人类能够更自觉、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当然这种安排必须是有条件的。那么，人类又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呢？主要是靠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如恩格斯所言，要能动地、自觉地调节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影响，只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① 实际上，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对制度的关注热情就未曾中断过。正是由于制度问题的重要性，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制度研究在全球乃至中国走向繁盛，从制度的起源、构成、功能、精神基础到演进与创制，从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从古代制度演变到现代制度的变迁，各种研究可谓蔚为大观。对当代中国而言，现代化事业正处于体制和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度现代化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实现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必须积极应对现代性在社会制度体系中不断成长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制度现代性问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对理论创新提出的迫切要求。本书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和实践背景下探讨当代中国的制度现代性问题的。

一 时代与实践熔铸的重大课题

现代性备受人们关注，不仅源于 20 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它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现代性渗入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多维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 521 页。

生产、生活，这足以使它构成一个具有超时空意义的重大课题。

现代性形成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它是人类现代化的结晶，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现代国家所具有的诸种特质，比如经济的持续增长，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灵活性增加，文化教育的世俗化、大众化以及现代人格出现，等等。现代性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强调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对立，把征服与被征服作为主、客体关系的实质，把工具理性作为主体行动的根本逻辑。

与现代性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将现代性引入并使之渗透到非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在该社会和文化中起支配作用的特质。现代化就是现代性的生长、发育和成熟过程。由于作为结果的现代性是遍布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所以现代化广泛存在于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其内涵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精神文化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前进过程，各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轨道上不停地前行，由一个阶段迈进到更高的阶段。遍观当今世界，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正在向更高层次的现代化水平迈进，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差距而进行艰苦努力。发达国家的晚期现代性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成熟的现代性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然而，就在我们努力植入和培育现代性之时，现代性在它的发源地却变成了一个问題。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付出沉重代价的进步过程，是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统一。积极方面在于，为社会造就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民主的制度环境以及人本的价值取向，在更大程度上把个人或群体从自然和社会的依附状态下解脱出来，展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景。消极方面在于，在人的主体地位提高的同时，人的自由、价值、意义等逐渐黯淡以至丧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异化。现代性的这些消极后果与现代化开始时启蒙理性所承诺的人类的美好前景相去甚远。于是人们开始怀疑和反思现代性，批判的锋芒直指现代化的精神基础——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现代性由此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和理论难题。这一问题或难题的实质就是，对现代物质成就的追求如何转化为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肯定。

现代性日益表现出的破坏性、毁灭性，使它被怀疑、拷问、批判，成为亟待被超越的对象。

虽然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将不断地加深各种矛盾，但彻底地规避现代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和人的个体化等，这些现代性的基本特质，是我们必须实现的目标。

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这一过程也是现代性逐渐生成的过程。随着西方现代性步入尴尬境遇，中国的现代化更呈现出特殊的复杂性。这表现在，我国现代化所缺乏的东西恰恰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东西。如中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要求国家越来越注重对个体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必然带来主体性原则的张扬，但这一原则却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对象。再如，同西方一样，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样需要理性的支持，这其中不仅需要工具理性的拓展，而且还包含对理性自身的反思批判，即理性不仅要认识到自身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发展，还要认识到它所带来的危害和灾难。但在西方，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却被归咎于理性，理性因而受到指责。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接受主体性原则和理性原则的洗礼，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发生迟滞；但如果中国尽情地拥抱主体性原则和理性原则，即便我们能够迅速推进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困顿就有可能在中国上演。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和弊端，我们能够避免吗？如果不能避免这些弊病，那我们的现代化还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吗？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把现代性的弊端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佳的发展效果？这就是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复杂困境。

二 制度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形态解析与求解

实践表明，现代化是发生并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不同的，特定阶段的主要任务构成了现代化的核心步骤。而主要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直接决定着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就当代中国而言,变革旧的传统体制,构建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体系模式,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现代化的眼光审视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和转型,也即对制度现代化问题的探讨,是时代和实践对理论创新提出的迫切要求。制度现代化不仅包括社会体制的重新审视和再造,而且涉及对习俗、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和扬弃。这是现实提出的迫切任务,也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性的挑战。

制度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层面,也就是现代性在制度体系中生长、发育和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必然在其中有所表现,形成制度现代性问题,也即制度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在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问题具有超乎寻常的复杂性:一方面,西方制度中受到批判的理性化和个体价值取向虽然有很大的弊端和危害,但却是我们完成制度现代化所要接纳的,在这些原则贯彻到制度构建中时,如何避免出现在西方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我们需要作出取舍和权衡。另一方面,传统制度中对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原则基本上不适合现代化的需要,但其中某些东西可以医治现代社会的伤痛,这里也有一个如何选择和取舍的问题。

求解当代中国的制度现代性问题,就是揭示制度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形态,明确现代性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具体表现,探索如何既发展和培育制度现代性,保证制度现代化的成就,同时又克服制度现代性问题的弊端。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研究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创新。经典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诊治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弊症开出的救治药方。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存在使经典设想成为现实制度的客观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经典制度模式,在现实社会主义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实践中,由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经典设想与现实制度构建表现为一个双向互动的辩证过程:以现实制度设计向经典设想归附为主,经典设想因现实需要而变异为辅。在这个过程中,经典设想逐渐嬗变为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现实体制一度表现为对经

典设想的教条式移植。尽管历史上这种体制的绩效非常显著，但其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主要是片面发展重工业、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忽视市场机制和自我封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对传统体制的变革和创新也取得很大进展，现代制度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在继续推进制度体系的现代转型中，破解当代中国的制度现代性问题，避免陷入西方制度现代性的泥沼，构建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制度体系，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第二，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现代化泛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划分为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精神文化现代化。物质层次的现代化指物质生产方式由传统到现代的变革，如工业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制度现代化是制度为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而发生的变革；文化层次的现代化则表示社会精神文明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如确立现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述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制度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既是现代化的重要起点和根本前提，又是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不仅与经济技术密切配合，增强经济运行的活力和效率，创造出巨大的物质成就，还要协调社会现代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和维护社会发展的秩序，保证整个现代化的良性、协调发展。而只有深入探索制度现代性问题，我们才能够认识我国制度现代化的特殊性，全面把握制度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明确制度现代化的基本趋向，推动制度现代化的健康、协调、快速发展。可以说，研究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问题，不仅关涉制度现代化进程本身，还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

第三，回应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现代性展现出来的危机和困境让许多思想家感到绝望，如马克斯·韦伯的哀叹，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悲伤。但我们不能因此走上彻底否定现代性的道路。因为，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然失效，更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全然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了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只要面对现实，重新设计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现代性的潜力就一定会充分而健康地释放。在某种

意义上, 中国对制度现代性问题的求解可以说是对现代性新形态的探索, 这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 制度现代性问题的分析框架

在现代性成为“问题”之前, 许多思想家和学者已经开始反思现代性的阴暗面, 求解现代性问题。从历史文化脉络来看, 对现代性问题的求解存在两个基本的层次: 其一, 置身于现代性之内的批判; 其二, 置身于现代性之外的批判。前者是维护现代性而对现代性自身的批判, 目的是重建现代性。后者是彻底的现代性批判, 是根本否定和抛舍现代性, 主要代表是后现代主义思潮。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 在当时的思想家歌颂人类进步的必然性的时候, 卢梭就深刻地指出了人类进步所付出的极其严重的代价, 如道德的败坏、人的异化和社会的不平等, 并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证。当然, 卢梭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并没有触及理性主义这一现代性的智识基础。

较早对现代性的智识基础——理性主义发起挑战的是英国哲学家休谟。作为经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 休谟以习惯和经验来解释各种政治与法律制度的产生。在他看来, 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人们无意识创造的规则, 而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 理性是而且也应该是激情的奴隶。

尽管休谟在政治与道德问题上提醒人们应该慎用自己的理性, 但这一思想的实际影响并不大。相比较而言, 伯克对制度构想的理性基础的反思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关注。他承认社会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然的, 承认社会不仅是理性的产物, 承认社会的准则是习俗, 承认社会依赖于含糊的本能和癖好——甚至依赖于偏见。^①

19 世纪中期,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基本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然而, 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所带来的不是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人的普遍幸福和人性的充分发展, 而是痛苦、灾难和人性的异化。从这个时候

^① [美]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盛葵阳、崔妙因译, 商务印书馆, 1986, 第 680 页。

起，人们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批判逐渐增多了。这种怀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启蒙理性遭到人们的贬斥。

尼采最先意识到西方理性主义的危机并宣告了理性与上帝的共同死亡，这是对现代性的精神基础的消解。继他之后，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和理性化的消极作用的激进批判，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孕育了后现代主义的庞大思潮。

尼采之后，马克斯·韦伯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提出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现代性问题。在韦伯的视野中，合理性就是西方现代性的本性，现代化进程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

韦伯从合理性范式入手对现代社会的病理特征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两大类，其中合理性行动又分为目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和实质（价值）合理性行动两类。目的合理性主要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实质合理性则主要归结为目的与后果的价值。在韦伯那里，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基本同义，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意义也基本一致。据韦伯的观点，目的（工具）合理性与实质（价值）合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从工具或目的合理性出发，价值或实质合理性行为是非理性的；反之，从价值或实质合理性的观点看，纯粹工具或目的合理性也是非理性的。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韦伯认为，作为过程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社会延展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断裂、冲突，以及目的合理性压倒实质合理性，在社会各领域处于支配地位。本来，合理化包含着对自由、正义、人性的追求，然而，由于合理化实质上是化实质合理性为目的合理性，结果导致价值和意义无法获得理性证明而存在，形式化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窒息了自由、正义、人性等基本价值。

实践证明，由马克斯·韦伯揭示的推动近代社会发展的两大精神力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认识和分析现代社会的极其重要的视角。社会学家帕森斯曾指出：“韦伯站在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几乎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像他那样把握住了旧制度崩溃的事实与本质。比起任何个人来，他对确定新的学术方向作出的贡献更大。这种新方向对于

研究正在上升的社会界的形势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①

韦伯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学者，理性化成为韦伯之后许多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现代性及其局限的最重要的分析框架。

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存在于各个领域，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人的直接现实，主要表现在：人类主体活动的“物化”；人类主体的“物化”；人与人关系的“物化”；人的意识的“物化”；法律与国家的“物化”；资本主义文化的“物化”；“物化”造成资本主义科学和哲学的片面性。^②但是，卢卡奇没有提出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除“物化”现象，他认为，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和影响，就必须首先根除人的“物化”意识。

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③马尔库塞把工具理性扩张所造成的社会称为单面社会，把被这种社会全面操纵和控制的人称为单面人。针对社会工具理性化的弊端，马尔库塞主张用新的理性去代替技术理性，在他看来，这种新的理性应该包含批判和否定精神，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的统一，是理性与感性、理性与幸福的统一。^④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重新考察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两种理性是有机统一的，但是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工具理性日益扩张，科学主义思潮导致了人本主义思潮衰微。

马克斯·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重要的学术思潮。他们的思想启迪了一大批学

① 转引自〔德〕汉斯·诺贝特·菲根《马克斯·韦伯》，王容芬译，三联书店，1988，第168页。

② 参见蒲济生、侯秋月《卢卡奇物化理论综述》，《中国西部科技》2007年第8期。

③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7~8页。

④ 阳海音：《论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批判》，《学理论》2010年第1期。

者继续进行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

在 20 世纪后半叶，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并未停止，主要的代表是哈贝马斯、罗尔斯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同样是以韦伯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命题为基础的。他认为，现代性方案不是一个因遭受失败而必须放弃的构想。相反，在理性的基础上重建现代性，是我们不容背弃的使命。哈贝马斯主张发掘理性的潜力，重建对于理性的信念，以完成现代性这个“未竟的事业”。他试图用内在于言谈之中的“交往理性”克服现代性困境，并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体制——生活世界”架构去分析、检视和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病态，寻找脱离这些困境的基本途径。

面对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罗尔斯重新检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得失，批判了功利主义，提出了以“作为公平之正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范式，阐述了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他所理解的自由原则是，在确保个人自由权利优先的同时，注重平等互惠、统筹兼顾，对于弱者给予特别的关照，对个人自由权利进行适当的社会限制。这表明，罗尔斯对于现代社会价值认识的基点已转向社会的公平正义。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即 20 世纪，引者注）变得尤为明显。”^① 在现代性的二重性中，吉登斯重点分析了现代性的消极面或阴暗面。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参量”^②。另外，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后果尤其是严重后果面前，人类并非无能为力，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超越它。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 6 页。

②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第 4 页。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也把理性作为批判焦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范畴和理论。同哈贝马斯、罗尔斯、吉登斯相比，后现代主义尽管也反思现代性，但在哲学和认识论立场上与他们存在重大差别，创设了后现代的多种话语，这些话语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宣告社会现代性（理性化社会）的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彻底否定启蒙、理性和现代性。如福柯所谓的“人已死亡”，利奥塔提出“宏大叙事”的消失，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二是描绘了后现代性的社会形貌，如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等。

后现代理论家们尽管各自的视角不同，但较为共同的观点在于都把现代社会看做由于理性化极度扩展而导致的一种支配系统，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也表达了一种对现代性阴暗面的批判，且这种批判大多指向理性化。但是，后现代理论表现出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却遭到了人们的批评。正如哈贝马斯所评判的：“对理性的激进批判是以告别现代性为代价的。”^①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方面。实际上，后现代理论对 20 世纪后期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所引起的传媒、信息、知识、文化等在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变化作出了敏锐回应，并提出和发现了许多崭新的问题和领域。正是主要基于对这些领域的考察，后现代理论家断言了新的社会形态，如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等的来临。他们的许多思想是极富创造性的。

从上面的简略回顾不难看出，现代性问题确实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但仍然是一个未解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它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大多遵循了理性化这一视角。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自从 18 世纪末以来，现代性话语有一个重要主题，即社会控制力量的弱化、私人化和分裂，简单地说，就是理性化对生活实践的破坏，激发了对宗教统一力量之替代物的需要。^②

可以说，由马克斯·韦伯总结的近代社会发展的两大精神支撑力

①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7, p. 336.

②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7, p. 139.

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不论人们对它的具体评价如何，都无法否认它从两个相反方面把握了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基础。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人类现代化事业一直都未能脱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互作用。因此，后发展国家要推进本国现代化，就不能不在客观上遵循这一基本趋向，而要想实现健全、合理的现代化，就不能不以互补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推动自身的发展。

不难领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反思和认识现代性问题的最具代表性与说服力的框架。这一视角极富涵盖性、时代性、实践性，既能够充分地吸纳和承接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又能够对后现代理论或后现代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

制度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分析也离不开这一基本视角。具体来说，制度现代化表现为人类理性力量对人们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的渗透和控制，它的病理问题源于理性化的极端化或畸形化。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角度研究制度现代化，就更能够抓住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症结，在批判和反思制度现代化的精神基础的同时，确立能够根除制度现代化的病态特征的根本原则，消除人们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的异化状态。

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角度研究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就是把两者的统合作为处理和应对中国制度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尺度，分析现实中制度体系构建与这一尺度的一致程度，明确我们今后的应然选择。

由于现代性或现代化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因此使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样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制度现代性问题，就有一个是否适用的问题。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理性”与“理性化”概念是西方的语言规则的抽象物。“在欧洲的语境中，这些概念与它所指涉的对象至少具有历史的约定关系，而在中国的语境中，甚至这种约定关系也不存在，存在的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语言支配。”^①这样的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成立的。

①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参见《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32页。

无疑，任何概念都是某种语境的产物，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只要类似的语境出现，相关的概念也会应运而生。此外，某一概念的语义的变化，是随着一定的语境的变化而发生的。以“理性”概念为例，西方哲学赋予它以认识能力和认识之源、价值之源的含义，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说法。只不过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这一概念演绎出与现代性相关联的含义，而这样的社会语境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因此自然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语义。但是，如今随着现代性这样的对象与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假如我们找不到更准确、更合适的概念来刻画、解释它们，那么运用理性与理性化概念来解释有关的对象与事实，就成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了。^①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这一概念的使用现在已经出现泛化的趋势，即不同国家的人们不仅用它们分析本国现代化问题，还用它们解释前现代社会的发展。作为人类精神力量的两个基本方面，运用它们分析中国的问题也未尝不可。同时，本书主要是把这一概念框架具体化于制度现代化的分析中，而不是纯粹地探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问题。在研究中，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框架的运用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规范，这是正确运用这一框架的保证。

四 相关研究述要

本课题主要是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角度研究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相关理论研究要涉及的最基本问题有四个：第一是制度现代化问题，第二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及其关系，第三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第四是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对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关系的设定。

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来说，这四个方面相互牵扯，彼此勾连，具有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不能随意拆解。下面简略考察一下各个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由于专业领域、研究旨趣以及选题偏好、时代变化等诸多原因，

^① 参见陈嘉明《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